

齐廉允 著

K242.09/
19

唐朝

開國六十年

大唐开国，峥嵘六十年，留下了多少故事？铸就了多少传奇？
李渊代隋，瓦岗聚义，玄武门之变，贞观之治，武后夺宫，二圣临朝……
初唐风云酝酿盛唐气象，三代君王开创鼎盛基业，
六十年漫漫征程，一个伟大帝国正在崛起。

齊魯書社

唐
朝

開國六十年

齊廉允 著

齊魯書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唐朝开国六十年 / 齐廉允著. — 济南: 齐鲁书社, 2009.9

ISBN 978-7-5333-2251-9

I. 唐… II. 齐… III. 中国-古代史-唐代 IV. K24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46471 号

唐朝开国六十年

齐廉允 著

出版发行 齐鲁书社

社 址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 编 250001

网 址 www.qlss.com.cn

电子邮箱 qlss@sdpress.com.cn

印 刷 山东人民印刷厂莱芜厂

开 本 720×1040 / 16

印 张 15

插 页 3

字 数 200 千

版 次 2009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33—2251—9

定价: 28.00 元

目 录

第一章 开国建唐

- 谁是首谋者：太原起兵的是是非非 / 2
- 由“尊隋”到“代隋”：建国策略的转变 / 11
- 刘文静之死：忠臣的困惑 / 16
- 新朝廷：重建国家制度 / 21

第二章 天下归一

- 夺陇石、平武周：西北战事多 / 28
- 瓦岗悲歌：小民的追梦之旅 / 35
- 降世充、灭建德：一战定乾坤 / 44

第三章 骨肉相残

- 李建成：被刻意歪曲的开唐英才 / 52
- 兄弟反目：攻守之间 / 57
- 决战宫门：踏血而来的“圣君” / 63
- 太上皇的悲剧：并不快乐的晚年 / 69

第四章 革故鼎新

- 整顿宰相班子：巩固帝位的“换血术” / 74
- 改革政府机构：完善中央集权的新举措 / 78
- 完善科举制：“天下英雄入吾彀中” / 84
- 定《唐律》：依法治国的努力 / 89

第五章 威加海内

- 破东突厥：雪耻之战 / 94
- 平吐谷浑：解河西走廊之围 / 100
- 挺进西域：畅通“丝绸之路” / 104
- 灭薛延陀：彻底安定北方边境 / 109

第六章 怀柔远人

- 德被四夷：淡化矛盾的新思路 / 116
- 华夷一家：民族平等的先声 / 120
- 册封与和亲：“因俗而治”谋和平 / 123
- 大都会：长安城里的异域客 / 130

第七章 贞观之治

- 以民为本：从来民众不可欺 / 136
- 谏诤与纳谏：民主是个好东西 / 140
- 选贤任能：人才是根本 / 145
- 尚俭节流：奢靡乃国之大患 / 149

第八章 守成之君

幸运儿：飞来的太子之位 / 154

学做天子：李治的储君岁月 / 160

贞观遗风：发展仍在继续 / 163

大版图：“柔弱”君主的盖世武功 / 168

第九章 武后夺宫

新生活：武氏的两次入宫 / 176

正位中宫：李勣的推波之功 / 182

大清洗：元老旧臣的末日 / 190

第十章 二圣临朝

参政：走到台前的“后宫之主” / 198

争锋：帝后斗法 / 204

封禅：华丽表象的背后 / 212

平衡：“二圣”格局谁做主 / 217

唐朝开国六十年大事记 / 223

参考文献 / 231

后 记 / 233



开唐建国

唐之取天下，

迟回以起，

若不足以争天下之先，

而天时人事适与之应以底于成。

高祖意念之深，

诚不可及也。

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二〇《唐高祖》

谁是首谋者：太原起兵的是是非非

行走在浩如烟海的史籍中，肯定会发现一条“潜规则”：每一个朝代的开国之君都会被本朝史家赋予某种特殊的才能，头上的光环被无限制地放大，他光辉神武的形象容不得半点玷污与非议，只能被供奉在庙堂之上享受朝拜与香火，在一条“神化”的道路上愈走愈远。但唐朝似乎是个例外，开国之功一股脑地被堆砌在太宗李世民身上，而唐朝的第一代君主——高祖李渊则被后世史家描绘成一个沉湎酒色、无所作为、胆小怕事的平庸之人。为什么唐朝如此“另类”呢？为何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如此贬低、抹黑他们的开国之君呢？历史的真相如何？李渊是否真的就是如此不堪的一个人呢？

任何著名人物在历史舞台上的出现，都是一定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必然产物。但是，由于各人的出身、经历、素质以及登上历史舞台的方式又是由许多偶然因素促成的，所以，他们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和产生的影响，也就各自表现出极偶然的



唐高祖像

特质。唐高祖李渊自然也不例外。

李氏家族煊赫,李渊是典型的贵族子弟。尽管史籍中对其籍贯和家世的记载都不尽真实,但可以确信,自李渊的祖父辈开始,李氏家族就已跻身处于政治中心的军事贵族集团的核心地位。

李渊的祖父李虎追随西魏时的军事霸主宇文泰开拓关内局面,立有大功,官至太尉,为统兵的六柱国之一。李虎初被封为赵郡公,后又改封为陇西公。北周建立后,李虎虽已亡故,但仍被追封为唐国公。李渊的父亲李昞官至北周安州(今湖北安陆)总管、柱国大将军,袭唐国公爵。他为政清明,声誉很好。李昞的妻子是独孤信(西魏统兵六柱国之一)的第四个女儿,独孤信的长女是宇文泰之子北周明帝宇文毓的皇后,第七个女儿则是隋文帝杨坚的皇后。李昞与周、隋两朝的皇帝都是连襟,因此,在周、隋之际,李氏家族都安享富贵,圣眷不衰。

李渊生于长安,幼年丧父,七岁袭唐国公爵。生于勋贵之家对李渊后来从事政治活动打开了方便之门。首先,周、隋时代的显贵使得李渊可以毫不费力地踏上仕途,为其后来起兵建唐奠定了深厚的政治基础。其次,李渊家族“尚武”,他的祖父李虎正是因武功超群、参与佐周代魏而飞黄腾达,到了李渊这一代,这个传统不仅没有丢弃,还得到发扬。李渊就以神勇著称,他武艺高强,尤其善射,史书中记载的两件事足以为证:其一,李渊向窦氏家族求亲时,就是因射中画在门屏上的孔雀眼才成功当选为乘龙快婿;其二,李渊任山西河东抚慰大使,在镇压龙门母端儿起义时,就曾连发七十余箭,箭箭中的,例无虚发。超人的武功,为李渊日后一统天下创造了条件,加之李渊步入仕途后,历任武职,常

年的戎马生涯,使他逐渐目光如炬,不但看清“隋历将尽”,而且为建唐铸就了运筹帷幄、叱咤风云的政治和军事才能。

除了豪门背景赋予的巨大优势之外,李渊自身还有不少他人不具备的素质。一是人际关系好,朋友多。《旧唐书·高祖本纪》载李渊“倜傥豁达,任性直率,宽仁容众”,凡他接触的人“无贵贱咸得其欢心”。这样,有识之士接踵而来,天长日久,羽翼自丰。二是处事谨慎,深谙世道。长期的宦海沉浮,特别是隋炀帝滥施淫威、失道寡助的现实教训,使李渊变得十分谨慎老练,韬光养晦,能把自己的心思深深隐藏起来,连自己周围的人,甚至是自己的儿女也难以觉察。三是李渊不但能“弯弓射大雕”,而且兼通文史,博学多才,既有武将的胆略气魄,又有文士的足智多谋。客观环境造成的有利条件和李渊自身所具备的素质,表明他可以担负起领导灭隋建唐、改换朝代的历史重任。

李渊心存叛隋起兵的念头已非一日,只是在正式起兵之前的几年里,一直处于隐蔽状态。大业七年(611),隋末农民起义的序幕拉开之后,统治集团内部开始分崩离析。目睹天下动荡的局面,李渊也产生了“代隋”的念头。据《旧唐书·宇文士及传》载,李渊与宇文士及“往在涿郡,尝夜中密论时事”,所谈的“时事”,即起兵反隋之事。这可由武德二年(619)宇文士及归降唐朝时,李渊笑谓裴寂的话中得到证明:“此人与我言天下事,至今已六七年矣,公辈皆在其后。”既是武德二年之前六七年的事,当然就是太原起兵前四五年事。裴寂劝李渊起兵在大业十三年(617),自然“皆在其后”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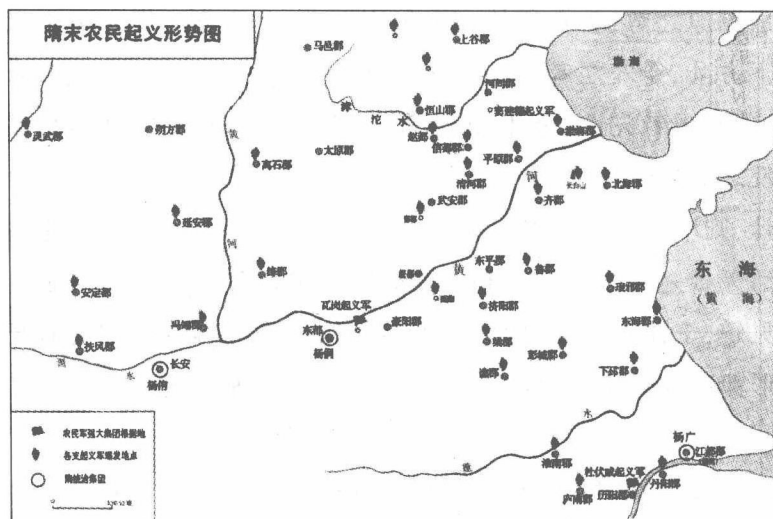
大业十一年(615)四月,李渊出任山西河东抚慰使,奉命镇压此地的反隋活动。李渊的副将夏侯端见反隋义军渐

成燎原之势,就劝说他:“金玉床摇动,此帝座不安。……天下方乱,能安之者,其在明公。但主上晓察,情多猜忍,切忌诸李,强者先诛,金才(即李浑,隋朝大臣。隋炀帝疑其有谋反之心,诛杀其全家三十二口)既死,明公岂非其次?若早为计,则应天福,不然者,则诛矣。”(《旧唐书·夏侯端传》)这番话无疑是对当时形势和李渊处境的精辟分析。对夏侯端的见解,李渊完全赞同。由此可见,李渊起兵反隋的念头,随着形势的发展也在滋生膨胀,只不过需要等待时机的成熟罢了。

两年后,李渊被任命为太原留守,这一看似平常的任命却成为推动历史转折的契机。隋朝末年,起义军遍地开花,在黄河下游、江淮之间几乎全被起义军控制的时候,隋朝在北方控制的最重要据点除了西安、洛阳之外,就数太原了。控制了太原,无疑就等于在隋的心脏地带建立了稳定的根据地。因此,李渊把这次任命看成是天赐良机,把太原看做是自己的“福地”,私下对李世民说:“唐固吾国,太原即其地焉。今我来斯,是为天与。”(《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一)这年四月,突厥进犯马邑,李渊派副留守高君雅率军与马邑郡守王仁恭协力拒战,但出师不利,被突厥打败。愤怒的隋炀帝要惩治李渊和王仁恭。当李渊将被押往江都问罪之时,他无限懊恼地对李世民说:“太原乃是王者龙兴之地,我正是因为此而被怀疑,并招来杀身之祸。没有及时举兵,我真是后悔啊!”

由上可见,李渊到太原之后,反隋的心志更加坚决,把太原变成了反隋的大本营。他命长子李建成密切联络河东(今山西永济)各军事割据势力;命次子李世民在晋阳(今山西太原)招兵买马,积蓄力量;他自己也广泛搜罗人才,逃避





隋末农民起义图

征辽诏令的隋朝官员、犯法逃亡的有罪之人全部委以重任，为反隋大业进行着积极的组织准备。

大业十三年(617)初,李渊以“伐辽”为借口,指使刘文静伪造了一份隋炀帝的诏书,扬言征集太原、西河、雁门、马邑等地二十岁以上、五十岁以下的男子全部当兵,决定在岁末集中于涿郡(今北京西南),再次东征高丽。听到这个消息,百姓人心惶惶。如此一来,李渊不仅为自己起兵反隋制造了条件,同时还可以乘机在人心混乱的情况下,广结贤士,扩充实力,壮大队伍,真可谓一箭双雕。二月,李渊又借口刘武周谋反,以“讨刘”为名,下令李世民与刘文静等广泛征兵,并日夜加紧训练,为起事做准备。五月,李渊设计剪除了隋朝派来的亲信王威、高君雅二人,纯洁了队伍,扫清了障碍。处决王、高二人,表明李渊已公开与隋朝决裂,吹响了起兵反隋的号角,拉开了创建大唐的序幕。

李渊既然已经决定起兵,他就必须要正视与突厥——

这股北方强盛势力的关系,因为,此时突厥的强大和攻击力是任何政治势力都不能漠视的。隋朝末年,突厥走上快速的发展道路,实力大增的突厥对在中原地区活动的政治力量任意捭阖,肆意插手地区事务。在突厥的强大压力下,隋末北方的割据者如陇西薛举、河北窦建德、洛阳王世充、马邑刘武周、朔方梁师都、河西李轨、北平高开道等都向突厥称臣,接受其可汗封号。显而易见,当时北方所有的割据者无一例外地要依靠突厥的扶持,没有谁可以不借助突厥的支持而称雄一方。

李渊在太原起兵之初,与所有割据者的身份地位并无多少区别,但他并不甘心做一般的割据者。他是一位雄才大略、深谋远虑的政治家,他的目标是要进取关中,夺取全国政权。从战略全局来说,李渊在起兵前的顾虑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担心“兵行已后,突厥南侵”,难以抵防;二是担心北方群雄联络突厥扰其背后,“引为边患”,妨碍自己全力进军关中。这两点是影响李渊能否在太原起兵以及起兵后能否成功的关键因素。李渊经过反复权衡,认识到要消除隐患,必须效法北方其他割据者,向突厥“屈节连和”。因为他已清楚地看到,“突厥不和,无以经邦济时也”(《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一)。于是,在对当时形势做了全面的剖析和估计后,李渊制定了北连突厥的政策。

在这种策略的推动下,李渊亲自写信给突厥可汗,在信中,李渊向突厥可汗提出三点要求:一、恢复隋文帝时的和亲政策;二、征伐中所得的“子女玉帛”全部归突厥;三、请突厥不要深入内地,坐享其成即可。在给突厥可汗的信封上,李渊坚持用“启”而不用“书”,以下对上的意思成功建构了与突厥的和平关系,免除了后顾之忧。突厥可汗接到信后,

十分高兴,遣使通报李渊,表示愿意派兵协助攻取长安。

大业十三年(617)六月,突厥使者运送千匹战马到太原交易,并许诺要派兵相助,派多少兵由李渊自定。为了防止刘武周勾结突厥进犯太原,李渊又派刘文静出使突厥,请求突厥出兵,共取长安。临行前,李渊告诫刘文静说:“突厥骑兵进中原,这本是老百姓的大祸害。我之所以要他们前来,是担心刘武周勾结他们扰乱边疆,威胁后方。再说,突厥战马靠游牧,不费草料,稍微用来壮大声威就可以了。只要几百人即可,不要多了。”后来,突厥真的派兵五百、马匹两千来援,李渊得知后,很是兴奋,高兴地说:“这真是上天派来助我完成大业的力量啊!”

在与突厥成功结盟并获得安定的后方之后,李渊于大业十三年(617)七月命四子李元吉留守太原,亲自与李建成、李世民率军三万兵发长安,正式走上反隋的道路。

拨开历史的层层迷雾,不难看出,李渊是一个老成持重、胸怀大志、富于斗争策略的人。太原起兵就是在他的主持下进行的。其实,从当时各阶层人士的众望所归和李氏父子自身的条件而论,李渊的确是起兵的首谋者。晋阳长姜谟察觉到李渊的动作,私下对自己的亲信说:“隋朝的天下就要灭亡啦,一定会有命世大才出现,唐王有霸王的气度,我看他一定是位可以拨乱反正、成就大事的人。”于是有意结纳,最终投靠了李渊。可见,李渊的“命世人才”及“霸王”地位,是时人所公认的,这种优势是当时的李世民所不具备的。

大业十三年(617)李渊在太原起兵时,李世民尚不足二十岁,一无官职,二无军职,最响亮的头衔就是李渊的二公子。而李渊刚刚五十岁出头,身体健康,位高爵显,具有稳固

的政治基础和丰富的军事经验，这些都是年轻的李二公子难以企及的。

从年资、阅历、人望乃至实际的政治智慧、军事经验来说，李世民都不可能成为太原起兵的首谋人物。但并不否认，李世民参与了太原起兵的谋划，并且承担了其中某些极其重要的具体任务，但这并不能抹杀李渊的首谋之功。只有李渊才是太原起兵的首谋者，这就是历史的真相，真相岂容随意篡改和抹杀？

既然太原起兵是李渊首谋之功，那么为什么官修史书把这一切都记在李世民账上呢？形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有二：

一是因为贞观史臣对这一段事实的记载失真，有些情节故意“饰非文过，曲笔诬书”（《旧唐书·刘子玄传》）。这是



李渊太原起兵雕塑

因为,李世民的皇位不是由合法继承得来,而是通过“玄武门之变”杀兄逼父取得的。这种行动显然不合乎封建法统和封建伦理,因此,李世民要千方百计把自己打扮成唐王朝的缔造者来进行自我辩护。李世民的这般心思,贞观史臣自然心领神会,在《高祖实录》、《太宗实录》的撰写中,房玄龄、许敬宗等人便极力称颂李世民,贬斥李渊,为使龙颜欢悦,甚至不惜捏造“虚语”,编造“奇说”。这样做的目的,无非是试图造成这样一种事实:既然起兵反隋这样的大事都是由李世民首谋完成的,那么,后来他取得帝位也就顺理成章、无可厚非了。

二是因为历代史家以讹传讹,到了后晋,刘昫等人依照贞观史臣著成的《高祖实录》、《太宗实录》而撰写的《旧唐书》,便得出了“太宗与晋阳令刘文静首谋劝举义兵”的结论。这个观点到了宋代不但被沿袭下来,而且有所发展。欧阳修、宋祁等撰写的《新唐书》中亦称“高祖起兵太原,非其本意,而事出太宗”。一代史学大家司马光虽然发现并指出房玄龄、许敬宗在记载大唐创业史时“语多微隐”,但还是草率地做出了“上指李渊之起兵晋阳也,皆秦王世民之谋”、“高祖所以有天下,皆太宗之功”的判断。司马光之所以也持这种观点,除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对史料的鉴别难以达到准确的客观原因之外,司马光的思想还不能不受到时代的局限,没有跳出“成王败寇”的思想窠臼。至此,“太宗首谋”、“高祖平庸”、“大唐创建,归功世民”的观点便成定论。承袭沿传久之,后人对这个结论也就深信无疑了。

拨开乌云见月明。

由“尊隋”到“代隋”：建国策略的转变

大业十三年(617)七月,李渊决定由太原起兵,兵发长安。在发兵的誓师大会上,他历数了隋炀帝的暴政,明确打出了“废昏立明”、恢复隋文帝宏伟业绩的旗号。其实,“尊隋”的起义口号,早在正式起兵之前就已经确定下来。这年六月,裴寂向李渊建议:“请尊天子为太上皇,立代王为帝,以安隋室。”(《资治通鉴》卷一八四)这一建议被李渊采用。

李渊早有反隋而称霸天下的野心,并且为起兵灭隋进行了长期的准备。但有意思的是,早有称帝野心的李渊在起兵之时打出的旗号却是“尊隋”,这不是与其心中的愿望背道而驰吗?李渊此举的真实目的又是怎样的呢?

其实,“尊隋”与“反隋”都只不过是斗争的策略与手段而已。老谋深算的李渊自然不是甘心为他人做嫁衣裳之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打出“尊隋”的旗号至少可以取得三方面的有利因素。

其一,可以避开乱臣贼子的恶名。在当时,“君为臣纲”的思想占支配地位,隋炀帝尽管荒淫残暴,官僚贵族也都视其为十恶不赦的罪人,但“君君、臣臣”的观念仍然根深蒂固,因此,以臣弑君,以下犯上,不管在何种情况下,都是一种罪恶。一个想成就大事的人一旦与“弑君”连在一起,必然会臭名远扬,根本不可能获得支持与拥护。当宇文化及在江都缢死隋炀帝之后,虎贲郎将麦孟才、虎牙郎钱杰等人就相互商议说:“我们屡屡接受隋炀帝的厚恩,现在发生了化及弑君的大逆不道之事,臣子还有何面目活在世上,我们一定